



我们

〔俄〕叶甫盖尼·扎米亚金◎著 高源◎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我们

(俄) 叶甫盖尼·扎米亚金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高源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 / (俄罗斯) 扎米亚金著; 高源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
(独角兽文库)

ISBN 978-7-5675-2262-6

I. ①我… II. ①扎…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3071号

我 们

著 者 (俄) 叶甫盖尼·扎米亚金

译 者 高 源

特约编辑 宣慧敏 夏永为 顾晨芸

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审稿编辑 高淑贤

装帧设计 叶金龙 陈 斌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9.25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

书 号 978-7-5675-2262-6/1.1200

定 价 32.00元 (精装)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导 读

米拉·金斯伯格

《我们》在扎米亚金的人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部小说是他哲学思想的浓缩，它以惊人的准确性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以及他的国家的未来。扎米亚金的信条借助《我们》中女主人公的话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出来：“没有最后的革命。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我真的不想让任何人来要求我。我只要求我自己”。

这两条准则：永恒的变化，以及个人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和自己的意志去选择、要求、创造的自由，支配了他的人生和他的创作。“我们会打碎所有的墙壁，让绿色的风吹遍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女主人公这么说。因此，她被那些要求统一和均匀，以及彻底服从外部意志的人们憎恨，驱逐；那些外部的意志来自国家、大恩主、党。

扎米亚金是一个有力量的、独树一帜的作者，是完全现代的。他深深扎根于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中。他是果戈里和陀思妥耶

夫斯基的直接传承人，这两位作者是他童年的最爱。他也非常近似于列斯科夫、契诃夫、谢德林，以及他自己的同时代人阿列克谢·雷米佐夫和安德烈·别雷。如同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深切地关注政府的道德问题；像以上提及的所有作家，他是讽刺家、文体和怪诞艺术的大师。

扎米亚金1884年出生于列别姜——位于俄罗斯黑土地带心脏的最富色彩的小镇之一，离莫斯科大约两百英里。那里是一片沃土，有古代的教堂和修道院、乡野传说、吉普赛人和骗子、修女和客栈老板、丰满红润的俄罗斯美女，以及一夜暴富或一夜赤贫的商人。这也是一个保留了有着丰富表现力的民间讲演的地方，扎米亚金将其表现手法加以吸收，后来用在了他的许多故事、戏剧和中篇小说中，起到了非凡的效果。

他的父亲是一名东正教牧师，在当地的学校传授宗教。他的母亲是一名天才钢琴师。

虽然曾作为一名海军工程师受训，扎米亚金却从很早开始就在文学上颇有建树。191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外省传说》。1914年，发表了《在世界的尽头》，讽刺一个遥远的边防城镇的军队生活。刊载《在世界的尽头》的杂志很快因发表该小说被沙皇当局查禁，编辑和作者因为“丑化俄国军队”被审讯。虽然对他们的指控最终被驳回了，可这只是扎米亚金一生与官方发生的冲突中的一例而已。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圣彼得堡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扎米亚金加

入了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他在1905年革命期间被捕，被关了好几个月的禁闭，释放后被驱逐出了圣彼得堡。在列别姜停留了短暂时间后，他回到了首都，在那里“非法”生活（甚至继续着他的学业），直到1911年警察抓住了他，他再一次被驱逐。就是在这一次驱逐期间，他写下了《一个外省传说》。1913年他被赦免，被允许居住在圣彼得堡。

从工学院毕业后，他受邀成为了该校的教职人员。有好多年，他的文学创作几乎被教学和工程工作所取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扎米亚金被派往英格兰，去设计和监督最早期的俄罗斯破冰船的建造。1917年革命爆发时，他无法忍受远离祖国，于是带着两个讽刺英国生活的故事匆匆回国。这两个故事是《岛民》和《渔夫》。

在俄国，扎米亚金（不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以惊人的能量投入到革命之后兴起的伟大的文化与艺术浪潮中。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矛盾重重的时期。俄罗斯经历了多年战争与革命，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了废墟。整个经济几乎垮掉了。交通、通讯、食品供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全都是一团混乱。然而就在饥饿与寒冷之中，一群奉献的灵魂不仅视拯救国家文化为己任，还把将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呈现给迄今为止缺衣少食又缺乏教育的民众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高尔基是那些严酷的日子里俄罗斯文学名副其实的保护神，在他的带领下，俄国形成了大量的文化组织，作家、学者和艺术

家们重新有了热情，他们也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工作。在彼得堡，这些组织包括“艺术之屋”（1920年在伟大商人叶利谢耶夫没有暖气的前宅邸成立的，作家们栖居在那里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空房间）；包括“科学家之屋”；还有众多的出版社和文学期刊（扎米亚金在其中的几家杂志社的编委会工作）。还有人组织了工作室，年轻的作者们师从扎米亚金、古米廖夫、洛津斯基、丘科夫斯基等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大师们也都倾囊传授其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经常赤足穿过冰冻的城市，来到工作室，他们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旧大衣，围着破围巾，虽然饥寒交迫，却都全神贯注在关于文学的未来的探讨中。

此外，各式各样的学校和运动在不断产生，不仅延续着从战前就开始复苏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东西。象征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阿克梅派诗人、理想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之间展开了狂热的、无休止的辩论。当然，加入这些争论的还有人数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批评者，他们掌握权力而雄辩，喜欢表达，认为文学不过是革命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而已。扎米亚金成为了“谢拉皮翁兄弟”的领袖和老师，这个团体有当时最有前途和最独特的年轻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弗塞沃洛德·伊万诺夫、瓦伦丁·卡达耶夫、维尼阿明·卡韦林、康斯坦丁·费丁、列夫·朗茨、尼古拉·迪霍诺夫和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其他人。他们的脾气、创作方法和创作领域各不相同，可他们都同样坚持创作的自由，坚持艺

术家追求个人愿景的权利，坚持创作形式的多样性和实验性，以及创作技巧的重要性。

列夫·朗茨是团队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他起草了一个宣言，在其中宣告了“艺术是完全自由的”的理念。“文学的想象，”他写到，“是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对抗着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他们说：“如果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起，你就是反对我们”。“我们跟谁在一起，谢拉皮翁兄弟？”列夫·朗茨问道，“我们是跟隐士谢拉皮翁在一起……我们摒弃功利主义。我们不是为了宣传而写作。艺术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并且，如同生活本身一样，艺术没有目的或是意义，它存在，是因为它必须存在……我们的想法是：作家的声音永远不能是虚伪的。”

“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们重新凝聚在扎米亚金的信条下：“真实的文学只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文学不是由勤勉和值得信任的官员所作，而是由疯子、隐士、持异端者、梦想家、反叛者和怀疑论者创作的。”这个信条是他在1921年宣告的，出现在他的文章《我害怕》^①之中。他对异端学说宽容，他对官方教条说“不”，他相信真实不比谬误更有用，真实“已经受到动脉硬化的折磨”，这些信仰在扎米亚金的写作中反复再三地被强调。在《明天》中，他写到：

① 这篇文章连同本文中其他所引内容，见于《一个苏联的异端：尤金·扎米亚金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

今日发现自己理念的人，都像罗德的妻子^①，已经变成了一根盐柱……这个世界只有通过隐士的创造才能保持生机：隐者基督、隐者哥白尼、隐者托尔斯泰。我们的信仰便是你们所谓的“异端邪说”……我们叫来俄国的知识分子，令其去保卫人类，保卫人类的价值。我们呼吁，不是对那些幻想回到过去而摒弃今日的人们，不是对今日不抱希望、对今日置若罔闻的人们，我们是对这样的人们呼吁，他们看见遥远的明天，并以明天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来评判今天。

1921年，在一篇题为《天堂》的文章中，他猛烈地抨击了那些鼓吹一统性的人，以及那些强制要求彻底从众的人。

许多人都提到过宇宙的不完美……他们用二元对立解释一切：水和火，高山与深渊，圣人和罪人。如果（上帝）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简单的如水之于火的对立，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宽恕了人类野蛮的自由状态，那人类生活会是怎样一种绝对的简单，

① 罗德是《圣经·创世纪》里说的一位君子，住在所多玛（Sodom）城里。由于所多玛、蛾摩拉（Gormorrah）两地的人罪孽深重，上帝决定降天火毁灭他们，事前遣天使叫罗德携妻子、女儿一起出城，但“不可回头望”。罗德的妻子按捺不住好奇心，出城之后回头望了一眼，马上变成了一根盐柱。后来，人们就用“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好奇”（curious as Lot's wife）一语来说“好奇心太重”。

怎样一种未被任何思想遮蔽的幸福啊！……我们毫无疑问生活在一个宇宙的纪元里——一个创造新天堂与新大地的纪元。我们当然不会再重复（他的）错误。不会再有复调音乐，不会再有不和谐音。只会有庄严的、不朽的、无所不包的一统性。

在《新俄罗斯散文》（1923年）中他写到：

今日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其平坦的现实性：它不是沿着旧的定点展现的，而是沿着爱因斯坦思维式的、革命式的活跃的坐标点来展现的。在这种新的展现中，众所周知的公式和对象被错置了，变得奇异，变得既熟悉又不熟悉。因此今日的文学会倾向于荒诞的情节，或成为现实与虚幻的混合物，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在他的论说文《关于文学、革命、熵和其他物质》中，他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核心理念：

革命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会经历革命。它是无限的。没有最后的革命，没有最后的数字。社会革命只不过是数字中的一个无穷数而已。革命的法则不是社会法则，它要更伟大，不可估量。它是一个星际的、宇宙的法则——就像能量守恒和能量耗散（熵）……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到：

有害的文学比有益的文学更实用，它是反熵的，它是抗钙化的一种手段……它是乌托邦的、荒谬的……150年后，它就是正确的。

此外，他在自己的一则最重要的声明中也重复了类似观点：

在今天的文学中，我们需要的是广阔的哲学眼界……我们需要最极端的、最可怕的、最无畏的“为什么？”，以及“然后呢？”

1926年，在《目标》中，扎米亚金对共产主义批评家们做了正面的抨击，他们要求作家们彻底服从党的意志：

革命不需要期望施舍物或是害怕鞭子而“顺从”的狗。革命也不需要训练这种狗的人。它需要的是无惧任何事物的作家……它需要的是心中被革命唤醒了真实的有机回声的作家。至于这种回声是否是个人的，至于一个作家是否忽视了在一个如此这般的会议上采纳的如此这般的一个段落，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是诚挚的，它引导读者向前……它能激发读者，而不是麻痹读者的心灵……可是向前去往哪里？向前到多远？越远越好……降低物价，给城市配备更好的卫生设施……所有这些都非常好……我可以想象一篇关于这些话题的棒极了的报纸文章（一篇明日就会被

遗忘的文章)。可是我发现很难想象一部基于卫生系统的改善而写的类似于列夫·托尔斯泰或是罗曼·罗兰的著作的作品。

不可避免的，扎米亚金成为了“一统性”和“干净”文学的鼓吹者的首要打击对象之一。他因为“与革命不协调”，“对革命宗旨和成就污蔑与中伤”，因为是“一个冷漠、充满敌意的旁观者”和一个维护敌人利益的“国际流亡者”而被攻击。（几乎无需在此列出那份与他同时代的独立艺术家的长名单：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布罗德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在独裁政府那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在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来自正统势力的卫道士们众口一词地恶言不断，扎米亚金仍然有可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的作品当然没有出现在官方发起和资助的杂志上。它们通常都刊载在非常短命的新闻杂志或是作家团体发布的选集里，或是登在读者很少的私人期刊上，或被私人出版社出版，而这些私人期刊或出版社在那些年里都依然被允许存在。

扎米亚金怀着极大的诚实和勇气，继续写下其所见所感——杂文、戏剧、小说——即使独裁政府的控制力已越来越强。在论说文《剧院的未来》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性格。这篇文章写于那段经历过去多年以后，1932以法语发表。“最严肃的戏剧，”他写道，“是口袋里放着一张时间表的戏剧，在许久以前就起草和盖章了，标记着我们每一个人悲惨的最终时日。”毫无疑问，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依然在做他觉得必须做的事。

在当时的情形下，他写作的领域和质量是惊人的。扎米亚金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讽刺家和文体家，也是一个可以掌握多种主题的文体大师。他的一些故事^①使他童年时代的神秘旧俄不可思议地还魂，读起来像民谣——风景是荒凉的，人们和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悲惨的或是漫画化的。他还有一些作品影射当下，经常被加上一种怪异的、倾斜的、超现实的色彩，文中塑造的形象能引发广泛共鸣，现实与非现实、嘲讽与悲伤结合得妙不可言。其他作品是笑话，是他称之为“不敬的故事”的粗陋创作。除了这些，扎米亚金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出人意料的特征，即抑制不住的作乐习性，以及丰富的滑稽感。

同样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对漫画和怪异风格的热切关注，也充分反映在了他的戏剧中。他的许多人物角色刻画都是一幅幅杰出的讽刺画。机智、想象，以及一以贯之的一丝不苟的技艺都以深厚的历史感和卓越的预见性结合在了他的许多作品中。这一点在《我们》中特别真实。《我们》是一部让人感到灼热的讽刺小说，写于1920年至1921年，说的是一个受作息时间表支配的社会（因此，必定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故事。《我们》未被允许出版。它在1923年的全俄作家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被朗诵，引发了来自拥护党的路线的批评家和作家们新的一拨猛烈攻击。

扎米亚金在极权主义刚抬头时便写作了这样一部非凡的预

① 见《龙：尤金·扎米亚金的十五个故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言小说。如同所有伟大的讽刺家一样，他从当下的趋势和暗示里预见到一个即将到来的社会。他的方法，正如他在《我们》中定义的，是“还原到最后”，这种方法后来被威廉·戈尔丁（《继承者》《蝇王》的作者）和安东尼·伯吉斯（《不合格的种子》《发条橙》的作者）这样的讽刺大师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诗人、嘲弄者（“笑”，他写道，“是最具破坏性的武器”）、用艺术倾尽一生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异端战士，对所有个人崇拜思想、所有压迫者、所有鼓吹“强制性的拯救”的人来说，扎米亚金是一个顽固的敌人。他无情地攻击和嘲弄了正在冒头的极权主义，包括奉承讨好的平庸、残忍的统治、对自由和创造这种人类精神的冒犯和破坏。他预见了如下这一切：恐怖，背叛行为，灭绝人性，无所不在的“护卫”；对思想和行为的控制，要么让人变成纯粹的机器人，要么让人成为为了活下来而撒谎的伪君子，被接连不断地“洗脑”；任何人都必须尊崇大恩主的要求。大恩主用他的“肃清”之手，将所有反对他的人，所有热切地想要做自己的人，化成一滩清水。

扎米亚金还预见了把艺术当成傀儡的趋向。他的主人公夸耀说：“我们驯服和驾驭了诗歌中曾经狂野的元素。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闲散、放浪的啼鸣，诗歌是对公民的服务，诗歌是有用的。”书中写到，在仪式化的集权主义状态中，人们（“号码们”）必须参加大恩主灭绝任何持不同见解者的狂欢典礼，一位诗人也被迫背诵一首颂歌，来歌颂行刑者的英明及其伟大的“正义”。

同样，在其文体上，《我们》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为扎米亚金有着完美的鉴赏力和品味。“我们当代的语言如密码一样快狠准。”1923年，他这样写道。《我们》有着如诗歌一般精巧的结构，读者在其中找不到《一个外省的传说》中那般舒缓如歌的丰厚度，也见不到他的“不敬的故事”中那样狡黠的笑。描写正方形的国家和正方形的人们，《我们》的写作文体具有极端的严肃性和纪律性——这种文体与他的思想、与他唤醒的那个被彻底控制着的世界有着完美的呼应。在扎米亚金唤醒的那个世界里，个人情绪是被禁止的（却禁止不住），每个人都是住在玻璃墙围起来的都市里，生活在玻璃房屋中，以绝对的直线按照时间表来生活的，在那里，甚至性行为都是按照规定的日期和规定的时间进行的。

但正如扎米亚金绝不仅是一个热情的政治知识分子一样，《我们》也绝不只是一篇政治宣言。它是一部复杂的哲学小说，有着不尽的精巧和丰富意味，处处都在影射和反映。它也是一部深刻而动人的人类悲剧，是一部对于人类复杂感情（热情——D-503；支配——I-330；嫉妒——U；柔弱，温和，彻底的奉献自我——O-90）的研究。而且，尽管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号码”，他们却不是表格式的数字；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个体，是可信的、栩栩如生的。

扎米亚金在这部小说中主要关注了人类身份多样性的问题：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依赖于安全却不自由的环境

与想要自由身份的愿望之间的冲突；疏离造成的恐惧和吸引力；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罅隙。《我们》也是对宣称基于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研究。正因为基于理性，这个社会也就死气沉沉，非人性，荒谬不堪。

“他们是谁？”当主人公见到大一统国的城墙之外那些温柔的、毛茸茸的生物之后问道。“是我们遗失的另一半吗？”那是有感觉的另一半，是生活在时刻表和直线之外的非理性的另一半。即使是在不允许任何即兴而为的事物存在的大一统国里，在这个被城墙阻隔开一切、没有章法的、充满活生生的事物的国度里，生命和人性都有着自己的呼声。主人公——一位被他自己的社会彻底塑造着，却对此毫不置疑的建造师和数学家——有返祖的“毛茸茸的手”。他被引诱了，以至于拥有了猛烈而非理性的热情，他震惊地发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长期被隐藏的王国——个人身份之国，自我之国。“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的？”他绝望地喊。在一个悲喜交集的场景中，他去拜访一位医生，寻求帮助，以治愈这吓人的怪病。医生严峻地告诉他，他病得很重——他有了一个灵魂。“那样危险吗？”他问道。“无法治愈。”医生答道。可是，天啊，到最终，他却被治愈了。恩主的爪牙们已经找到了一种针对人类个体性、叛逆性、人性的治疗方法：一个简单的手术，就可以摘除掉感染一切的病灶，最后让大一统国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呵呵傻笑的半白痴。

《我们》比奥威尔写于近三十年后的《1984》更加多元，读

来也没有后者那么无望。《1984》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了扎米亚金小说的影响。除去其悲剧性的结尾，《我们》依然还带着一丝希望的曙光。虽然造反溃败了，“城市的西部地区依然还有斗争”。许许多多的“号码”们已经逃到了城墙远远的那一头。那些死去的人不是作为机器而被消灭的——他们死于战斗，死于不屈。即使主人公被改造成成了一个顺服的机器人，确信“理性”和永恒的秩序会占上风，即使他迅速爱上、最后被出卖的女子死去了（诗人们和她领导下的反叛者们也死去了），可是那个爱着他的女子，那个温和而柔弱的女子，却安全地生活在城墙之外。她将会在自由的环境下生养他的孩子。最终，城墙自身也被证明了是不堪一击的。它已经被攻破了——当然还会被再次攻破。

在《我们》中，扎米亚金说，这就是我们正在前往的地方。趁还来得及，停止吧。在诗性与嘲弄之间，依然还有温暖，关乎俄国，关乎人类，依然还有深切的同情——对于他们即将遭逢的特别极端的苦境（也就是20世纪俄国所处的恐怖时代）。这种苦境，在小说中被奇异地预见到了，也被如此深刻地面对。对扎米亚金而言，他自己也深受这些苦境之害，但他完全没有愤世嫉俗或是表现得痛苦不堪，他是非同寻常的。他愤怒，嘲弄，反叛——但是没有顾影自怜，没有哀叹不已。他似乎是在对所有独裁者，对所有试图强制地把生命用严谨的模型来禁锢的人说：你们不会，你们也不能占上风。人类是不会被摧毁的。